

刘宏小说《鹊桥》中的伦理身份与选择分析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An Ethical Literary Study on Liu Hong's Novel *The Magpie Bridge*

肖淳端 (Xiao Chunduan)

内容摘要:《鹊桥》除了富有历史、文化旨趣,还充满深厚的伦理内涵。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剖析留居英国的女主人公骄梅在流散境遇中面临的伦理困境和选择,以图揭示该作品的深刻思想和文学价值。文章指出,留居海外赋予华人多重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中英历史纠葛、中西文化差异和流散中的多重伦理身份交缠,给英国华人带来剧烈的伦理冲突。《鹊桥》在艺术重现鸦片战争这一中华民族创伤的同时,生动展现了深受中英历史恩怨围困的流散个体从华人到英国华人转变的过程中确认伦理身份的困难,并深刻思考英国华人应如何借助道德教诲和伦理反思走出困境重构身份的问题。由此,《鹊桥》揭示了伦理选择对海外华人身份重构的重要意义,并使作品充满情感冲突、叙事张力和伦理关怀。

关键词:《鹊桥》;英国华人;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肖淳端,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华人文学和海外华人诗学。本文受广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英国华人文学刊物《聚言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GD19CWW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19JNQM03】、2019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项目编号:2019WTSCX003】资助。

Title: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An Ethical Literary Study on Liu Hong's Novel *The Magpie Bridge*

Abstract: Apart from being abundant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Magpie Bridge* is also a work with strong ethical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article takes a close look at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ethical choices encountered by the protagonist Jiaomei to explore the novel's profound merit. It finds out that being in diaspora brings to the Chinese in Britain a multi-facet ethical environment and multiple ethical identities, which with the 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provoke violent ethical conflicts. By representing the Opium Wars as a Chinese historical trauma, this novel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difficulties shouldered by the

diaspora individuals as they reconstruct themselves from being Chinese to British Chinese, but also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moral teaching and ethical reflection as a means for the diaspora to step out of their ethical predicament. As a result, *The Magpie Bridge*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making ethical choices on th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it also presents itself as an intriguing story with its emotional conflicts, narrative tension and ethical concerns.

Key words: *The Magpie Bridge*; British Chinese;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Author: **Xiao Chundu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fields of British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 poetics (Email: txchd@jnu.edu.cn).

《鹊桥》（*The Magpie Bridge*, 2003）是英国华人作家刘宏（Liu Hong）¹的英文代表作，与刘宏创作的其他三部英文小说一样，《鹊桥》关注中国女性在历史风云中所经受的磨难以及她们在困境中展现出的不屈精神，并在钩沉中国近现代历史之余，向西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关于这部小说，已有的研究侧重于该小说的文化内涵和女性书写，如李静解读《鹊桥》中的古诗、铜镜、花园等文化意象，认为这些文化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定式公用象征”，在西方语境中产生了“陌生化、再义化的奇异效果”，使得在汉语文化中已经钝化的象征，重新焕发了活力（李静 66-75）。陈美红（Red Chan）分析《鹊桥》的文化意象、语言符号的杂糅书写，认为其作为一份文化翻译实践，揭示了流散个体如何通过杂糅化解中西文化冲突及重构流散身份。² 萧韵华（Yun-hua Hsiao）从《鹊桥》的母系关系和中国文化意象着手，剖析文化书写与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关联，认为小说对富含中西方文化内涵的花园意象的书写，尤其是通过书写花园为联结的母系关系，“确认了女性的集体权力”（Hsiao 7-28）。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鹊桥》丰富的伦理内涵，不管是文化意象还是女性书写，其本质都和伦理身份密切相关。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剖析留居英国的女主人公骄梅在中英历史纠葛、中西文化冲突的流散境遇中面临的伦理身份和选择问题，以图揭示该作品的深刻内涵，并探讨伦理选择对海外华人身份重构的意义。

1 刘宏，1965年生于辽宁，1989年留学英国后定居英国，新世纪以来开始其创作生涯。除《鹊桥》外，刘宏还出版了《惊月》（*Startling Moon*, 2001）、《触摸》（*The Touch*, 2005）和《东风之妻》（*Wives of the East Wind*, 2007）等英文小说，刘宏同时也是虹影《上海王》（*The Concubine of Shanghai*, 2003/2011）的英文译者。

2 参见 Chan, Red. “Chinese Flower in the English Garden: Hybridit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Liu Hong’s *The Magpie Bridge*.”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8.4 (2007): 397-412.

一、“鸦片战争”：国恨家仇的道德教诲

《鹊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鬼”故事。留学生骄梅自幼父母离异，从小在中国与父亲、祖母相依为命。后来祖母、父亲相继离世，孤苦伶仃的骄梅获父亲昔日的英国情人芭芭拉资助，赴英留学。留英期间骄梅交了英国男友并有了身孕。就在她怀孕期间，骄梅时常“梦”见自己已故的祖母铁梅，铁梅对骄梅留居英国并与“洋鬼子”亲密无间非常不满。为了挽回家族名誉和民族尊严，祖母的亡灵不惜远赴重洋，来到伦敦劝说骄梅回国，并向她追叙了她们一家几代的辛酸史，控诉近代史上英国对中国曾犯下的历史罪恶，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中英鸦片战争，尤其是火烧圆明园事件。原来在清朝年间，铁梅祖上本是南方技艺精湛的园林匠人，得到皇上的赏识被招入京城。随后同为皇家园林御匠的五保和梅（铁梅的曾祖父母）在圆明园相识相爱，二人携手合作、倾尽所学参与打造了精美绝伦的圆明园。然而，英法联军入侵破坏了这原本美好幸福的生活，英法联军不仅残暴地将圆明园付之一炬，还杀死了当时为了保卫家园的五保，甚至为劫掠他们家一面祖传宝镜，杀害了手无寸铁的铁梅：

小女孩 5 岁时，有关洋鬼子入侵的消息传到他们耳中：金发的英国兵和法国兵和我们的武力相差悬殊，他们有枪有炮，而我们只有刀剑。
(……)

梅的脚很疼：她从没有这么快、这么长时间地跑过。她在一棵梅树下停下来喘口气。

等她抬头时，发现一个身穿红色制服的洋鬼子站在了她面前。她想要逃，却已经太迟。他一把夺过她的包袱，里面的东西掉了下来。一件闪光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是铜镜。他抓了起来。

梅疯了似的冲向他，尽管又小又弱，愤怒和哀痛却给了她极大的力量。她用牙齿当武器，狠狠地咬住那个洋鬼子。他大叫一声。盛怒之下，他举起了另一只手，把枪指向了她。他开了枪，她倒在地上，血从胸口喷涌而出。

那个小女孩是我的外婆，你的曾曾外祖母，她父母遇害那年是 1860 年。(34-35)¹

铁梅的祖辈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的历史见证人，铁梅是这一事件亲历者的后代，因此她口述的家史再现了 19 世纪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罪恶历史，并真实地描述了英法联军在中国劫掠宝物、杀戮平民的暴行。实际上，

1 本文有关《鹊桥》的引文均来自 Liu Hong, *The Magpie Bridge* (London: Headline, 2003), 译文为笔者译，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铁梅口述的是她一家与英国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小说写道：“对不畏敌众我寡的五保来说，他不止是在保卫皇帝的乐园，而是在保卫他自己的家，他和爱人共同建造的天堂”（34）。美好家园被毁、挚爱双亲被杀、家传宝镜被夺，凸显了英法联军入侵远不止是对中国国家财物的肆意毁掠，更是对中国平民百姓的无情戕害。铁梅随后又接叙了鸦片的祸害：铁梅一家原本家境殷实，自从父亲迷上鸦片后，家道中落，一家人流离失所、穷困潦倒。显然，铁梅家族的衰败起因于英国人在中国走私鸦片的恶行。可以说，对于铁梅的家族来说，鸦片战争不止是国恨，更是家仇，而英国便是导致这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

这一段几代人口耳相传的家史无不是铁梅及其家族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情操的独特表达，揭示了她们关于善与恶的道德评价标准。这个故事铁梅也不是第一次讲给骄梅听，小说写道，从骄梅5岁母亲离开后，祖母便来照顾她，于是每年清明节祖母便会给骄梅讲述这一段历史。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启蒙主要是针对儿童而言的，启蒙的主要方法是从讲述童话故事开始，其目的是让儿童从听故事中获得教诲”（聂珍钊 258）。不难发现，这一段故事其实是铁梅一家代代相传的伦理启蒙，其目的便是启蒙后人善恶恩仇，教诲后人不忘家族之仇、民族之殇，甚至还要伺机“复仇”——这位遇害的曾外祖母梅在弥留之际便嘱托姑子玉兰：“帮我照看我女儿，以后叫她替我们报仇”（35）。那么，铁梅的亡灵不远千里来到英国给已经长大成人的骄梅再次讲述这段家史，则是对她的伦理再启蒙和道德教诲。

除了祖母之外，还有一位同样重要的“教诲者”——那就是具有神力的祖传宝镜。小说中，只要是铁梅一家的血脉，便可以从铜镜中看到历史，骄梅也不例外。宝镜后来阴差阳错作为遗物又从芭芭拉的姑母手中传给芭芭拉，回到了骄梅的身边。于是，铁梅指引骄梅端详铜镜，在这面铜镜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再次上演：

看见了么，她正在抵死挣扎。听见了么，小女孩正在哇哇大哭。看，这个男人手上拿着枪，夺走了她的生命，夺走了她的宝镜。（……）现在，这是那场杀戮过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是的，这就是皇宫，那个曾经是中国最宏伟壮观、最精美绝伦的花园，现在践踏在满身臭奶味的鬼子脚下。他们欢呼雀跃、歇斯底里，他们酒气冲天、纸醉金迷。看见了么，地上全铺满了高到膝盖的丝绸袍缎，这是鬼子们从一间一间房子的柜子里搜罗出来的。看见了么，这个人将皇帝平日里用来款待皇子的翡翠杯摔得粉碎。这群鬼子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一个接一个醉倒在地上。（196）

铜镜以影像的形式使骄梅进入到一个特定的历史的伦理环境中，使她“亲

眼目睹”了英法联军对铁梅一家和祖国的伤害：正是这些丧尽天良的“洋鬼子”，才让5岁的先祖成为可怜的孤儿，才让承载着中华文化瑰宝的圆明园毁于一旦，才让中国几千年珍贵的宝物流落他乡……如此一来，铜镜集中体现了一种伦理语境，使骄梅有机会真真切切地体会祖母的仇恨缘由和家族的伦理禁忌。可以说，小说巧妙地借助铜镜的“神力”，将宝镜转化为一个记录历史的实体，使得火烧圆明园事件不只是仅存于家族口耳相传中的记忆文本或脑文本，而是有实体介质的影像文本。“文学最初的目的就是将禁忌文字化，使不成文的禁忌变成成文禁忌（……）在成文禁忌的基础上，禁忌被制度化，形成秩序，即伦理秩序”（聂珍钊 262）。铜镜的影像叙述，实质便是将先祖的禁忌“文字化”、“制度化”，使其不仅仅只被口耳相传，由此形成、巩固家族的伦理秩序。此时家族伦理秩序的重新唤起强化了原有的伦理禁忌，也将异国他乡的女主人公骄梅推向一个矛盾重重的伦理困境。

二、历史阴霾下的伦理困境与选择

铁梅重新带来的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国恨家仇给身在英国的骄梅带来了双重伦理困境。首先，是如何处理与芭芭拉的关系的问题，骄梅面临着的伦理困境是：一边是沉重的国与家的历史创伤，一边是没有亲缘关系的“母女”情深。芭芭拉对骄梅恩重如山，既资助她在英国上学，又提供住宿，并视骄梅若己出。文中多处谈及芭芭拉对骄梅的“母爱”：骄梅每天住在芭芭拉家，每次去上学，芭芭拉总会亲手给她做带餐的三明治；在得知骄梅有喜后，芭芭拉的反应是开心得“红着脸笑着，仿佛她才是怀了身孕的准妈妈”（60）；她对孕中的骄梅关怀备至，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她紧张兮兮，即使后来骄梅结婚了，芭芭拉也执意要骄梅继续住在她身边，以便“随时可以照应”（194）；芭芭拉还和骄梅“讨论尿布、宝宝房墙纸等所有一切关于宝宝的事情”……不难发现，芭芭拉为骄梅所做的一切正如骄梅自己所承认的，“是每一位母亲会为她的女儿做的事”（194），甚至芭芭拉给予的“比亲生父母还多”（59）。而骄梅心底也早已经将芭芭拉视为亲人，甚至是“母亲”。长期缺乏母爱的骄梅自从父母离异后，便一直在寻找母爱，而她不止一次告诉自己：“在芭芭拉身上我找到了”（191），“她就像是我的母亲”（93）。

然而，身在英国受芭芭拉供养、庇护的骄梅认同了芭芭拉的母爱，便是选择了与芭芭拉无血缘的“母女”关系，因此同时拥有了中国受害者后代和“洋鬼子”女儿两种伦理身份。祖母的出现唤醒她原本的受害者后代的身份，从而打乱骄梅选择新的伦理身份收获母爱、重建新生的计划，使得她不得不面对将芭芭拉视为母亲还是仇人的伦理困境，不得不在收获母爱和遵守禁忌的伦理两难中痛苦挣扎。祖母不能理解的是，与家族和民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洋鬼子”，怎么就可以和她的孙女如此亲密甚至母女相认呢？对她而言，骄梅触犯了一个不可侵犯的伦理禁忌——认贼作母，而这可是整个家族的伦

理禁忌。铁梅自述道：“怒火从我心深处燃起”。她责骂骄梅：“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你对祖先的死还是全然忘记了”（93）。折磨骄梅的伦理困境在昔日被夺的宝镜传到芭芭拉手中后犹如雪上加霜。先祖被“洋鬼子”杀害时曾发下毒咒：“所有持有宝镜的外人都不得好死”（35），充满神力的宝镜眼下落入芭芭拉这个“外人”手中也就意味着芭芭拉即将厄运临头，意味着对骄梅恩重爱深的芭芭拉将因为先祖的毒咒而命悬一线，这更将骄梅推向焦灼的深渊，使她坐立不安……可以说，小说描写的这一伦理困境同哈姆雷特在生父与养父之间的两难选择类似，这无不展现了这部作品情感的冲突、叙事的张力和思想的深邃，也给读者带来阅读的震撼。

这一段中英民族恩怨和骄梅先祖的伦理训导也给骄梅带来另一个伦理困境，即如何处理与英国男友肯的关系的问题。如今骄梅不仅“认贼作母”，还要与英国人恋爱生子，对铁梅来说，这就是选择了与杀害先祖的“洋鬼子”后代通婚，也就是与强盗、掠夺者、侵略者结亲，这是十足的大逆不道、背祖忘宗。“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约束，既通过伦理禁忌体现的约束”（聂珍钊 264）。由此可见，不同的身份决定不同的选择，骄梅留居英国这一系列的选择和行为与其“受害者后代”身份应遵守的道德规范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铁梅死后“重生”、漂洋过海对骄梅进行道德教诲的直接原因。铁梅要唤醒骄梅原有的伦理意识，让原有的伦理秩序回归。正因如此，尽管伦敦被铁梅视为“卑劣之地”（93）甚至是“地狱”（118），她依然不畏险阻穿梭其中；她找到骄梅后第一句话便是语重心长的“醒醒”（5）；而为了阻止骄梅因违反伦理禁忌而滑向不忠不孝的深渊，她不得不三番四次严厉训斥她最爱的孙女：“他占了你的便宜，你还高兴？”（64）“猴子都比你知廉耻！”（93）。

这重重的伦理冲突冲击着骄梅，使她不堪重负，她感叹道：“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63）。一方面，被唤起的原有的伦理秩序和伦理意识使骄梅对铁梅满怀愧疚之情，于是原本不信老一套封建传统的骄梅在清明节这一天特意跑去唐人街买来纸钱，在花园的梅树下焚烧纸钱祭奠祖母，并向祖母忏悔。另一方面，骄梅又时常因为受到祖母的道德“操纵”而难遏制住愤怒，甚至不时会因痛苦煎熬而情绪崩溃。她甚至还驱逐祖母：“你这个恼人的鬼，我希望你从没来过！”（65）。正如聂珍钊所言，“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聂珍钊 263），骄梅所受的痛苦便在于她因为流散选择拥有了不同的伦理身份，因此不得不承担几种身份各自不同甚至相悖的责任和义务，却无法同时履行。

三、跨代民族创伤与英国华人的伦理身份重构

在《鹊桥》中，祖母亡灵的出现亦幻亦真。铁梅本人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也是朦胧不清的：“我不太清楚我自己：仅仅是一阵香气，是她的过去

的一个魂灵”（36），骄梅则意识到铁梅实际上是她“出于思乡、寂寞、渴望而臆想的衍生物”（140）。在弗洛伊德、拉康等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心理学家尼古拉斯·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和玛丽亚·托洛克（Maria Torok）提出“跨代幽灵理论”（The Theory of the 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用以分析跨代的心理创伤。他们认为，祖辈所遭遇的创伤会在后代身上隐秘地出现，后代所备受煎熬的心理创伤有时并非“源自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是“源自别人的精神矛盾、创伤或秘密”（Abraham & Torok 166）。亚伯拉罕和托洛克把“异己的存在”（foreign presence）比作“腹语”（ventriloquism），涉及“幽灵”（phantom）、“鬼魂”（ghost）、“亡灵”（revenant）等形式。关于“幽灵”的由来，亚伯拉罕认为，它实则是对力比多心力投射（libidinal introjection）的抵抗，即是说，“它阻挠我们对言语的感知，暗自指向它们的无意识的部分”，“返世不褪的幽灵证明了埋葬于他者心底的亡者的存在”（174-175）。另一位创伤理论学者玛丽亚·鲁特（Maria Root）也曾指出：“前人遭遇的由各种暴行引起的创伤，也会通过各式故事代代相传……久而久之，此类创伤自然会表现在后代对某种环境刺激的反应中”（Root 374）。因此，与其说小说里面的祖母是一个亡灵，莫如说她是民族历史创伤的一个化身，投映在流散异国的后代的心间。她每次到来，倾诉的都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创伤，尤其是中英之间的历史恩怨。那么小说中骄梅与祖母的亡灵的冲突，实际上是骄梅身在异国他乡与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未克服的跨代民族创伤的冲突和挣扎，而这一切都与跨国流散有关。

流散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选择的过程，它既是流散者进行选择之后的结果，又让流散者面临新的伦理环境和伦理选择。骄梅从中国来到英国，并决意留居英国，便赋予了自己多重伦理身份。她的身份标签与原先单纯的“华人”相比，多了“英国”二字。在英国，骄梅与芭芭拉产生了类似亲人般的新的家庭情感伦理，与英国男友相爱并与之结婚生子同样给她带来新的伦理身份和伦理情感，她也因此面临新的伦理冲突和伦理选择。伦理身份的改变“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聂珍钊 257），诚如是，从华人到英国华人的身份变化，带来多重伦理身份和认同，也带来多重的伦理责任和秩序，直接导致了上述的伦理困境和混乱。在伴随着新的伦理身份而来的伦理困境中，如何处理新旧伦理冲突，如何处理新旧交替、新旧交缠的伦理身份的重构，是留英华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是这部小说巧妙构思、深刻思考的命题，它巧妙地将中英鸦片战争这个历史事件与英国华人的伦理身份转变所带来的伦理冲突结合在一起，刻意探讨深受中英历史恩怨围困的流散个体应如何面对复仇与谅解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在身份重构中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为一名英国华人，骄梅与祖母亡灵的交流实际上是她自我叙述民族创伤、再现历史创伤的疗释方式，亦是她在面对民族历史之重与当下异域生活之间精神纠葛的内心投射。骄梅坦言：“过去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沉重，它是

我很大的一部分——即便是现在的新生活，也不能改变着这一事实”（97）。她甚至时常提醒自己：“我不能老想着过去”（11）。而骄梅对创伤的疗释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梳理和理解，更关系着流散个体在流散境遇中如何定位自我和定位未来。恰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认为再现创伤是治疗创伤的有效手段，“疗释创伤是一个发声的过程（articulatory process）”，创伤得以治愈才能“分辨过去与现在”，才能“记起过去自己（或亲友）的遭遇，并清楚自己此时此地的生活”，才能“走向未来”（LaCapra 22）。

铁梅的亡灵，除了是华人的民族创伤、民族历史的化身，同时也是中华文化、民族传统的化身。小说中，铁梅总共到访 24 次，每次到访恰好在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日。故事镶嵌在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日当中，恰蕴含了中华文化、民族传统对流散华人无处不在的巨大影响，也揭示出骄梅身上背负的传统伦理的重负。小说中，祖母千方百计前来阻止骄梅“犯错”，除了警示其家族伦理禁忌，还带来了中国女性长期以来接受的传统规训——名声 / 贞洁，这同样也是中国女性长期面临的伦理禁忌。而祖母重述“邯郸学步”的故事（48），实质上就是在中西文化差异中，祖母害怕骄梅被西方文化所同化而忘了文化本源、文化传统。祖母亡灵的频频出现和谆谆教诲，无不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伦理代沟的巧妙隐喻。

而就在面对中英民族恩怨、中西文化差异的伦理冲突和选择时，骄梅得到伦理意识的重构，其道德行为也得到了反思和修正。骄梅向祖母坦白，她的怀孕是瞒着肯特意计划的。原来，尽管与英国男友肯真心相爱，骄梅却藏有自己的私心——作为一名留英学生，骄梅担心毕业之后无法继续留在英国¹，于是设计怀了身孕。被唤起伦理意识的骄梅此刻面临着是否要向肯坦白的伦理问题：如果坦白，那么就有可能失去肯，也就有可能失去继续留在英国的机会；如果不坦白，那么她就有道德污点。伴随着祖母的道德教诲，骄梅心中善与恶的尺度重又明晰，她选择了向肯坦白并承担了肯可能离去的后果。可以说，在重构伦理身份、重建伦理秩序的过程中，骄梅意识到自己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并及时修正，从而得到了心灵的净化、品格的升华。这蕴含了作者对海外华人伦理身份和选择的思考：在缺乏伦理道德指引的情况下，海外华人容易迷失自我，甚至误入歧途，而伦理意识的唤起，伦理道德的规导，有助于重新界定善恶美丑，使海外华人在变化的环境中做出审慎的选择，从而找回自我。“有伦理道德指引的时候，人就容易保持自己的伦理自我”（尚必武 31），人总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进行自我身份确认”，“伦理身份决定伦理选择，伦理选择也能建构伦理身份”（何卫华、聂珍钊 7），可以说，借助道德教诲和伦理反思，骄梅在选择自己的伦理身份的同时，选择了做有

1 芭芭拉出于英国人的文化背景，充分给予骄梅选择的自由，尽管愿意却从未主动提出让骄梅继续留下。

道德的人，保持了“伦理自我”。而身在英国社会，不管是为人女还是为人妻，骄梅的伦理选择本质关乎的皆是华人在流散国的社会化问题。只有通过伦理选择确认了自我，才能获得自我的接受和社会的肯定，才能真正地融入社会。可见，伦理选择对海外华人的身份重构有重要的意义。

《鹊桥》后面的故事发展给予了困境中的海外华人以希望和慰藉：肯最终选择了谅解并与骄梅重归于好，骄梅请求芭芭拉赠予她铜镜而破解“宝镜落入敌手”的毒咒，而祖孙两代的伦理裂缝，经过累月的协商，也终于得到理解和修补。骄梅深刻地体会到铁梅的仇恨缘由，“她唤醒了我内心强烈的民族耻辱感和家庭荣耀感”，终于“我对铁梅满怀同情”（201）。而铁梅也认识到芭芭拉与肯这两位英国人对骄梅的发自内心的爱，对他们的态度渐渐由“仇恨”转为“怜悯”，理解并接受了骄梅与他们不可割离的情感。小说结尾，骄梅和男友顺利结婚产子，铁梅的亡灵化作芭芭拉的花园中一朵嫣然绽放的梅花，横亘在骄梅心间的中英历史恩怨在象征着中英联结的爱情结晶以及在异域绽放的中国梅中得到化解。而肯得益于中国桥梁建筑美学及“鹊桥传说”而设计的桥也顺利在英国建成，再次点明了书名“鹊桥”的喻意——联结过去与现在，跨越不同世界、不同伦理身份而团圆美满的“喜”桥。由此骄梅成功重构了流散境遇中的伦理身份，走出困境，重获新生。这一个圆满的句号，无不代表了小说对在民族历史创伤中历经曲折、重构身份的英国华人的深切的伦理关怀。

留居海外赋予华人多重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中英历史纠葛、中西文化差异和流散中的多重伦理身份交缠，给英国华人带来剧烈的伦理冲突。《鹊桥》巧妙地融历史叙事与伦理关怀于一体，在艺术重现鸦片战争的中华民族创伤的同时，生动展现了深受中英历史恩怨围困的流散个体从华人到英国华人转变的过程中确认伦理身份的困难，并深刻思考英国华人应如何借助道德教诲和伦理反思走出困境重构身份的问题，由此揭示了伦理选择对海外华人身份重构的重要意义。从伦理身份的角度来切入该作品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该作品的情感冲突和叙事张力，准确把握该作品的深刻内涵和现实价值。

Works Cited

- Abraham, Nicolas, and Maria Torok. "Secrets and Posterity: The Theory of the 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 *The Shell and the Kernel: Renewal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 Ed. Rand, Nicholas T.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4.
- Chan, Red. "Chinese Flower in the English Garden: Hybridit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Liu Hong's *The Magpie Bridge*."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8.4 (2007): 397-412.
- 何卫华、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族裔文学: 聂珍钊教授访谈录", 《外国语文研究》1 (2020): 1-12。

- [He Weihua,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thnic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1 (2020): 1-12.]
- Hsiao, Yun-Hua. *Women in British Chinese Writings: Subjectivity, Identity, and Hybridity*. Oxford: Chartridge Books Oxford, 2014.
- La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2001.
- 李静: "双重语境中的象征: 论旅英作家刘宏的小说", 《中外文化与文论》2 (2008): 66-75。
- [Li Jing. "Symbols in Double Contextualization: On the Novels by the Chinese Writer in England Liu Hong."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2 (2008):66-75.]
- Liu, Hong. *The Magpie Bridge*. London: Headline, 2003.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Root, Maria P. "Women of Color and Traumatic Stress in 'Domestic Captivity': Gender and Race as Disempowering Statuses." *Ethnocultural Aspec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ssu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Eds. A. J. Marsella, et al. Washington DC: APA, 1996, pp. 363-387.
- 尚必武: "寻找伦理存在的自我——《培尔·金特》中的理性意志与伦理选择",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1 (2013): 23-32。
- [Shang Biwu. "The Self as an Ethical Being: On the Rational Will and Ethical Choice in Peer Gynt."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1 (2013):23-32.]